

摘 要

恶意创造力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以伤害自我或他人为目标的驱动下，实施的某些具有破坏性的创造性行为活动。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发展的敏感期，其认知和心理都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随着网络与数字化设备的普及，在家庭互动中出现的亲子科技干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亲子科技干扰这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易诱发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因此，本研究将考察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引导和保护青少年创新思维的良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采用两个研究探索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以及正念的干预作用。研究一采用《科技干扰量表》、《手机冷落行为量表》、《正念量表》、《恶意创造力量表》对河南省 792 名中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亲子科技干扰与中学生恶意创造力显著正相关；（2）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与中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正念调节亲子科技干扰对中学生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采用实验法，依据亲子科技干扰的得分选取高中生 28 人，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 14 人。实验组参加 8 周的正念训练，控制组不参加任何干预。结果发现：（1）实验组的正念水平显著提升，恶意创造力水平和手机冷落行为显著降低；（2）控制组的手机冷落行为显著增加。这说明正念干预训练确实可以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且能够改善中学生的手机冷落行为和恶意创造力行为。

综上，研究一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仅明确了亲子科技干扰是如何影响青少年恶意创造性行为的问题（手机冷落行为的中介作用），而且对亲子科技干扰导致手机冷落行为的差异进行了探讨（正念的调节作用）。研究 2 通过实验设计，证明了正念干预训练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手机冷落行为和恶意创造力。本研究结果对预防和降低青少年恶意创造性行为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恶意创造力；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正念；青少年

Abstract

Malevolent creativity refers to certain destructive creative behavioral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individuals who are consciously driven by the goal of harming themselves or others. While adolescents are in the sensitive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ir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are easily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devices,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in family interaction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a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is prone to induce malicious creativity in adolesc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on adolescents'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uiding and prote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Two studi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the intervention role of mindfulness. Study 1 used the Technology Interference in Life Examples Scale, Phubbing Scale, Mindfulness Sca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Scale to measure 792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nan Province; (2) Phubbing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alevolent creativity; (3) Mindfulness moderated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th of the mediation model, Mindfulness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hubbing.

Study 2, based on Study 1, us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o select 28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he score of parent-child technofence, and randomly assigned them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14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rticipated in 8 weeks of mindful trai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ny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mindfulness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phubbing; (2)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hubbing. This suggests that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training can indeed increase the individual's level of mindfulness and can improv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hubbing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s.

In summary, by construc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Study 1 not only

clarified the question of how parent-child technoference affects adolescents'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hubbing), but also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phubbing due to parent-child technoference in terms of individual fact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Study 2 demonstrated that mindful intervention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individuals' phubbing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Keywords: malevolent creativity; parent-child technoference; phubbing; mindfulness; adolescents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引言.....	1
第 1 章 文献综述.....	3
1.1 恶意创造力.....	3
1.1.1 恶意创造力的定义.....	3
1.1.2 恶意创造力的相关研究.....	4
1.1.3 恶意创造力的测量.....	5
1.2 亲子科技干扰.....	6
1.2.1 亲子科技干扰的定义.....	6
1.2.2 亲子科技干扰的相关理论.....	7
1.2.3 亲子科技干扰的相关研究.....	8
1.2.4 亲子科技干扰的测量.....	9
1.3 手机冷落行为.....	9
1.3.1 手机冷落行为的定义.....	9
1.3.2 手机冷落行为的相关理论.....	10
1.3.3 手机冷落行为的相关研究.....	11
1.3.4 手机冷落行为的测量方法.....	12
1.4 正念.....	14
1.4.1 正念的定义.....	14
1.4.2 正念训练.....	14
1.4.3 正念的测量.....	16
1.5 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16
1.5.1 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16
1.5.2 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17
1.5.3 正念的调节作用.....	18
1.5.4 正念干预.....	19

第 2 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0
2.1 问题提出	20
2.2 研究目的	21
2.3 研究意义	21
2.3.1 理论意义	21
2.3.2 实践意义	21
2.4 研究假设	22
第 3 章 研究一 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3
3.1 研究对象	23
3.2 研究工具	23
3.2.1 亲子科技干扰量表	23
3.2.2 手机冷落行为量表	23
3.2.3 恶意创造力量表	23
3.2.4 简式 Freiburg 正念量表	24
3.3 数据处理	24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4
3.5 研究结果	24
3.5.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24
3.5.2 各变量在学段上的差异检验	25
3.5.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26
3.5.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6
3.6 小结	28
第 4 章 研究二：正念干预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29
4.1 研究目的	29
4.2 研究假设	29
4.3 团体辅导方案设计及实施	29
4.3.1 被试	29
4.3.2 团体辅导实验设计与研究工具	30

4.4 结果与分析	32
4.4.1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得分差异比较	32
4.4.2 实验组与控制组后测得分差异比较	33
4.4.3 实验组前测、后测得分差异比较	33
4.4.4 控制组前测、后测得分差异比较	33
4.5 小结	34
第5章 总讨论	35
5.1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讨论	35
5.2 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36
5.3 手机冷落行为的中介作用	37
5.4 正念的调节作用	38
5.5 正念训练对恶意创造力的作用	39
5.6 本研究的研究局限与展望	40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42
6.1 研究结论	42
6.2 教育建议	42
参考文献	45
附录	58
致谢	63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坚持创新思维，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科学家的发现，还是企业家的创新，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创造力并非总是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各种各样的恶意创造力实例随处可见。日前，广东某中学生因课间恶作剧，不料致同学重伤，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也反映了中学生恶意创造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传统的欺凌、殴打其他同学的恶意行为，当前各种新式的恶意创造力层出不穷，比如：中学生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络上发布侮辱性言论、恶意评论或者散布不实信息来攻击、侮辱或威胁其他同学，造成对方的精神或情感伤害；发送虚假消息、制作虚假事件或欺骗他人获取金钱或财物等。由于恶意的创造性行为通常以原始或创新的方式出现，因此很难发现和预防(Gutworth, 2014)。因此，研究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对于预防和降低恶意创造力至关重要。

中学生正处于社会化的敏感时期，往往表现出“消极倾向的认同”，具有叛逆色彩的冒险心理特征，以及快速发展的创造性思维认知特征(Bonetto et al., 2021)，在面对学业、课堂、人际、身体等方面的压力时，他们的认知和心理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因素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创造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Fang & Shen, 2021; Miller et al., 2012)。虽然已有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Harris & Reiter-Palmon, 2015; Lee & Dow, 2011; Marwa & Milner, 2013; 史滋福 等, 2024; 张翔, 2022)。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父母的教养方式出现了新型的特征，比如在家庭互动中出现的父母使用科技产品导致交流中断的科技干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McDaniel & Coyne, 2016a)。随着科技的普及和亲子关系的演变，人们开始关注亲子科技干扰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有研究发现，父母使用科技设备导致的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关(McDaniel et al., 2018; Mcdaniel & Radesky, 2018)，当孩子的关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容易产生外化问题行为，如“违纪”、越轨同伴交往(Gramm et al., 2020; McDaniel & Radesky, 2018; Xie et al., 2019)，恶意创造力是典型的外化问题行为，它的形成可能受到亲子科技干扰的影响。当父母过度依赖手机等电子设备时，孩子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过度使用手机，从而导致手机冷落行为的发生。手机冷落行为不仅削弱了亲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可能使青少年在孤独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恶意创造力。然而，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能够帮助个体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生

活中的挑战和困难（Kabat-Zinn, 1990）。对于青少年而言，较高的正念水平可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亲子科技干扰和手机冷落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恶意创造力的产生。

因此，本研究将考察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引导和保护青少年创新思维的良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 1 章 文献综述

1.1 恶意创造力

1.1.1 恶意创造力的定义

创造力的标准定义最早由 Stein (1953) 提出, 即: 创造力是一种创新、发明新事物的能力。创造力包括新颖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 (Runco & Jaeger, 2012), 创造力被认为是促进个人、组织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Nakano & Wechsler., 2018)。一直以来, 创造力, 都被当作积极特质去看, 然而, 创造力也有隐藏的阴暗面。近年来, 研究者提出了创造力的黑暗面和恶性创造力的概念, Cropley 等人 (2008) 最早将恶意创造力定义为个体有意识地以伤害自我或他人为目标的驱动下, 实施的某些具有破坏性的创造性行为活动。例如: 某人采用特殊手段不被人察觉地报复他人; 某不法商家利用新颖的手法欺骗消费者等。恶意创造力是创造力的一个侧面, 因此也具备传统创造力所拥有的一些特点, 如新颖性、有效性等, 与此同时, 恶意创造力也具备其独有的特性, 即危害性 (Harris & Reiter-Palmon, 2015)。在这种创造力中, 人们常常能够以独特而富有创意的方式构思出各种形式的破坏性行为。这种创造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对他人或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而引发深远而持久的伤害 (McLaren, 1993)。综合前人研究, 本研究认为恶意创造力是个体有意识地以伤害自我或他人为目标的驱动下, 实施的某些具有破坏性的创造性行为活动。

与恶意创造力相近的概念还有消极创造力 (Negative Creativity), Cropley 等人 (2008) 是在 Clark 和 James (1999) 消极创造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分化出的恶意创造力概念。恶意创造力指的是以恶意或不道德的方式运用创造力, 强调其目的是为了伤害、破坏或欺骗他人, 例如精心策划的诈骗、有意误导他人的虚假信息、制造冲突或混乱的行为等。消极创造力指的是产生负面或有害结果的创造力形式。虽然消极创造力的目的不一定是伤害他人, 但其强调结果通常会对个体、组织或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 一个人可能通过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欺骗性广告来增加销售额。

总的来说, 恶意创造力是指有意利用创造力来实施恶意行为, 而消极创造力则是指虽然创造力的使用不一定是出于恶意, 但其结果却是负面的或有害的。虽然消极创造力概念也涉及创造力背后的恶意动机, 但恶意创造力概念的表述更为准确,

因此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支持 (Eisenman, 2008; Hari, 2010; Spooner, 2008; Walczyk & Griffith-Ross, 2008)。

1.1.2 恶意创造力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发现恶意创造力与环境、人格特质和情绪有关。

(1) 环境与恶意创造力

Clark 和 James (1999) 最早通过实验证明不公平的环境会产生更多的恶意创造力,这表明环境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显著塑造个体如何运用其创造力,并决定其是否选择以恶意方式行事。还有研究发现个体恶意创造性行为的产生往往受到一系列负性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消极的社会风气、不公平的社会条件以及被忽视的家庭环境等 (Clark & James, 1999; Croypley, 2010; Jia et al., 2020)。根据相关研究,威胁性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对个体恶意创造性想法的滋生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Baas et al., 2019)。

家庭系统理论强调,父母的教养方式作为家庭教育环境的核心要素,对子女的心理与行为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Garbarino, 2008)。研究显示,经历父母消极教养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并且其创新思维呈现出一种更为持久的特征 (De Dreu et al., 2012; 陈玉焕, 赵倩, 2012),这种创造性的表现,其创造性为往往指向恶意 (Jia et al., 2020)。还有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验证了童年时期缺乏父母关爱(即童年忽视)与大学生恶意创造性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 (Jia et al., 2020; Bedu-Addo et al., 2023)。

(2) 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

个体的消极人格特质或心理品质往往导致其在认知过程中带有恶意的偏见性 (Anderson & Bushman, 2002),这种偏见性使得他们更易于催生恶意创造力 (Jia et al., 2020)。多项研究聚焦于个体的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的关联的研究发现高攻击性特质往往伴随着更高水平的恶意创造力 (Lee & Dow, 2011; Harris et al., 2013)。Lee 和 Dow 进一步指出,具有攻击性人格的个体倾向于以恶意的方式思考问题,进而产生恶意创造力。特别是那些表现出高身体攻击性和低责任心的个体,其恶意创造力的表现更为显著。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当情境诱发个体的恶意创造力时,那些具有高内隐攻击性特质且不考虑行为后果的个体,其恶意创造力的表现更为强烈 Harris 和 Reiter-Palmon (2015)。除了攻击性人格,黑暗三联征这种人格特质也

被发现与恶意创造力呈正相关 (Jia et al. 2020; Kapoor & Kaufman 2022; Szabó et al., 2022), 黑暗人格特质在童年忽视与恶意创造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Jia et al., 2020)。

(3) 情绪与恶意创造力

James 等人认为, 恶意创造力是消极情绪、负性目标与观念形成过程相互交织影响所促成的。其中, 负性情绪可能会引导个体设定负性目标, 进而引发恶意创造力的行为。情绪的唤醒度或激活度、调节聚焦以及动机等维度, 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创造力的激发与表现。如果个体对环境产生消极情绪, 也会产生恶意创造力 (程瑞 等, 2021; 杨静, 2016)。进一步研究表明, 特别是愤怒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创造性恶意。一方面, 恶意创造力通常要求个体故意伤害另一个对象, 这通常是由愤怒触发的 (Anderson & Bushman, 2002); 另一方面, 过去的研究表明, 愤怒可以提高一般的创造性表现 (Russ & Kaugars, 2001; van Kleef et al, 2010), 而一般创造性能够预测恶意创造力 (Hao et al., 2016; Hao et al., 2020; 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1), 因此愤怒情绪可以促进恶意创造力的表现 (程瑞 等, 2021)。

还有研究发现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 在面临消极的情境任务和非常规用途任务时, 更倾向于展现出恶意创造力 (Harris et al., 2013)。这主要是因为低情绪智力者往往未能意识到恶意创造力行为的不妥, 同时也较少关注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1.1.3 恶意创造力的测量

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式主要包括问卷法和实验法两种。

(1) 问卷法

目前使用最广的是恶意创造行为量表 (郝宁, 杨静, 2016) 用于测量日常的恶意创造力行为倾向的特质测评。量表共 13 道题, 包含欺骗、伤害他人和耍诡计三个维度。本研究采用恶意创造行为量表来测量中学生的恶意创造力。

(2) 实验法

恶意情境问题解决任务: James 等人 (1999) 要求参与者对暗示消极的情境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 (例如, “尝试提出尽可能多的新颖解决方案, 以便在潜在客户面前诽谤竞争对手公司”), 参与者想法的创新性、逻辑性、易读性与答案数量被用作评定恶意创造力的指标, 这种方法的不足在于计算方案个数时没有排除非恶意的方案。

发散思维任务: Lee 和 Dow (2011) 参与者要求尽可能多地为常见物体 (如砖、铅笔等) 创造不同寻常的用途与恶意的想法 (例如, 打别人, 或者在被磨成粉末后

毒害别人)，由两个评分者选出，再用所有想法的总数除以恶意思法的数量来计算比例分数，但这种方法忽视了对发散物品任务新颖性的考量。

为了克服现有测量方法在计分与统计上的不足，并兼顾恶意性与新颖性的评估，Harris 等人（2013）提出了一种新的评价方式——正性与负性解决方案评价量表。该量表用于评估被试在恶意情境任务或发散性思维任务中的答案。每个答案都由两名评分员从恶意性和创新性两个维度进行点 6 点计分。只有当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超过 3 分时，该观点才会被认定为恶意创造力想法。统计这些想法的总数作为衡量个体恶意创造力水平的指标。

综上，在本研究中，研究一采用恶意创造行为量表，研究二采用恶意情境问题解决任务进行测量，并参照 Harris 等人（2013）测量恶意创造力的方法。

1.2 亲子科技干扰

1.2.1 亲子科技干扰的定义

新兴的移动和数字技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和其他移动设备，现在已经嵌入到幼儿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Radesky, Miller, et al., 2015）。然而当使用移动设备时，面对面的互动状态可能会受到破坏。这最初被描述为“缺席在场”，即身体在场但思想在别处的行为（Gergen, 2002）。近年来，研究者们把数字和移动电子设备造成的人际活动干扰称为“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不同的人际关系中都可能出现交流的中断或侵扰现象。例如，在伴侣间的互动中（McDaniel & Coyne, 2016b），朋友间的交往中（Brown et al., 2016），上司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中（Roberts & David, 2017），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中（McDaniel & Coyne, 2016a; McDaniel & Radesky, 2018），都可能发生此类情况。这些中断或侵扰不仅影响了交流的顺畅性，还可能对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当亲子关系中出现由电子产品或移动设备介入所引发的交流中断或阻碍现象时，这一现象被称为亲子科技干扰（Parent-child Technoference; McDaniel & Coyne, 2016a）。这种干扰可能发生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吃饭或玩耍等日常活动中，例如，父母在与孩子交谈时，突然收到信息，父母中断交谈回复信息。亲子科技干扰导致沟通减少、注意力分散、情感疏远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和互动质量（Chesley, 2005; McDaniel & Coyne, 2016a）。

与亲子科技干扰类似的概念还有父母低头行为（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 Xie & Xie, 2020), 亲子间科技干扰通常指的是家庭互动中科技设备的使用对亲子关系和家庭互动产生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而父母低头行为则是一种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和无法控制的行为, 前者强调互动中被动地打断 (McDaniel, 2015; McDaniel & Coyne, 2016a, 2016b), 而后者强调父母主动性地沉迷于手机而不参与互动 (Haigh, 2015; 龚艳萍 等, 2019)。综合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认为亲子科技干扰是指在家庭环境中, 科技设备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 的过度使用导致亲子关系和家庭互动受到负面影响的现象。

1.2.2 亲子科技干扰的相关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探讨了家庭运作的两个关键纬度: 家庭能力和家庭风格 (Beavers & Hampson, 2000)。该理论指出, 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通常与家庭内部的沟通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家庭成员间的人际互动问题往往与家庭内部的沟通模式紧密相连。家庭内部复杂而多变的关系网络对成员的情感表达、思维格局及行为模式产生直接影响。家庭中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导致亲子关系的恶化, 或是在外部因素介入, 比如科技产品的大量使用时, 这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良的亲子沟通。

依恋理论认为, 安全依恋的形成依赖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回应。父母在亲子互动中频繁地中断以使用电子产品时, 孩子可能会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关注不足, 导致信任感的减弱和亲子之间情感连结的疏远, 进而导致在亲子沟通时子女的关系需求不被满足 (Niu et al., 2020), 使得亲子关系恶化 (Xie et al., 2019)。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属于重要的微系统, 并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Bronfenbrenner, 1979)。亲子间科技干扰可能会扰乱家庭生态系统中的沟通模式。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态系统中, 成员之间的沟通是密切而频繁的, 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和情感连结。然而, 当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被突然打断, 他们会忽视与孩子的交流, 导致亲子之间的沟通受阻。

社会学习理论 (Bandura & Walters, 1977) 强调了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和受到激励来学习行为的过程。如果父母过度依赖科技产品并且在亲子互动中忽视孩子, 孩子可能会将这种行为视为正常或者可接受的模式, 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复制。这可能导致孩子自身对科技产品的过度依赖, 以及在与他人互动时缺乏关注和尊重的行为。

1.2.3 亲子科技干扰的相关研究

1.2.3.1 亲子科技干扰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花在设备上的时间越多,对子女的互动和回应就越少,这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减弱,影响家庭氛围的和谐度(Hiniker et al., 2015; Radesky et al., 2014; Radesky, Schumacher et al., 2015)。在亲子互动时间使用电子设备时,家长们表示很难在手机和孩子之间进行多任务处理(Radesky et al., 2016),因此互动的质量往往较低,有时会错过孩子的提示和注意力请求(McDaniel, 2019)。多任务研究表明,这种分散的注意力会导致在互动过程中出现效率低下和更多的错误(Chen & Yan, 2016; Dindar & Akbulut, 2016; Fox et al., 2009; Van Der Schuur et al., 2015)。还有 Radesky 等人(2016)对 31 位父母和 4 位祖母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当他们被科技设备分散注意力时,就很难准确地解释和回应孩子的暗示。根据置换假说(Coyne et al., 2014),电子设备与媒体所占据的时间可能会削弱本应与孩子和父母进行的亲子互动,导致亲子关系质量降低。

此外,父母还描述了他们在电子设备上参与的一些活动常伴随着各种情绪的波动(Radesky et al., 2016)。因此,当孩子试图通过手机获取父母注意力时,父母有时反应更为严厉(Radesky et al., 2014),甚至流露出愤怒的情绪(Radesky et al., 2016)。总之,科技的使用导致工作与家庭界限变得模糊,增加了工作、社交对家庭的负面溢出效应,诸如消极情绪的增加及家庭生活满意度的降低(Chesley, 2005; Mazmanian et al., 2005),这对家庭和谐与亲子关系均构成了不利影响。

1.2.3.2 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父母科技干扰可以影响儿童的外化(如多动、攻击)和内化(如焦虑、抑郁)行为问题(Elias et al., 2021; Grantham-McGregor et al., 2007; Hertzman, 2009; Keating & Hertzman, 1999; Kinsey & Hupcey, 2013; Klaus & Kennell, 1982; McDaniel & Radesky, 2018)。如果父母被电话或其他设备分散了注意力,他们可能会对孩子的暗示和需求缺乏意识,对孩子需求的执行不够准确,反应迟缓,也不能让孩子得到适宜的正面积极回应。也许是因为电子设备上的父母是类似于一张“静止的脸”,对孩子的暗示几乎没有情绪反应(Myruski et al., 2018; Stockdale et al., 2020),因此,被分散了注意力的父母可能会让孩子对父母形成更不安全的依恋(McDaniel & Coyne, 2016a; Radesky & Christakis, 2016; Stupica, 2016)。而不安全依恋又是焦虑、抑郁与攻击性的预测因子(Verma & Talebi, 2007; Yi et al., 2012),换句话说,为了更好应

对对不安全依恋，青少年向外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向内会产生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

过度依赖科技设备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减少，孩子可能会错失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建立密切关系的机会，这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社交焦虑等，研究表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子女社交焦虑显著关联（Cong et al., 2020; Heo, 2006; Knappe et al., 2010; Xu et al., 2017）。也有研究表明，父母忽视会提高孩子的社交敏感性（Otani et al., 2009）。当父母在和青少年相处时使用手机时，青少年对与父母的互动感到更消极，有时甚至认为父母不那么温暖和慈爱（Kushlev & Dunn, 2019; Steiner-Adair & Barker, 2013; Stockdale et al., 2018）。不仅如此，亲子科技干扰还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核心自我评价（陈欣 等, 2020），青少年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重要，这种情况最终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更多的焦虑、抑郁情绪，遭受网络欺凌的风险增加，同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和公民参与度也会降低（Stockdale et al., 2018）。

此外，在与父母交往的过程中，如果父母经常分心于浏览电子设备，子女很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青春期的青少年自我控制和自我认知能力相对较弱，而中国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媒介时，往往受到父母的严格监督。然而，当父母在自身行为上表现出不一致时，例如在严格监控子女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的同时，自己在与子女沟通时却频繁使用电子设备，这种不一致性可能会导致子女产生消极的认知，进而出现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Liu et al., 2012）。另一项研究表明，当看护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移动设备上时，孩子表现出更多动作或提高嗓门，和更多的冲动行为（Radesky et al., 2014）。

1.2.4 亲子科技干扰的测量

目前测量科技干扰的工具是 McDaniel（2016a）编制的科技干扰量表，该量表适用于多种关系，本研究将该量表应用于亲子关系之间，用于青少年评估在与父母进行交往时，由于父母使用电子产品而带来的亲子间互动干扰（刘勤学 等, 2021）。

1.3 手机冷落行为

1.3.1 手机冷落行为的定义

手机冷落行为（Phubbing）也称“低头症”、“手机低头行为”。最早出现在 2007 年 Macquarie 大辞典的广告活动中。Phubbing 这个词是 phone（电话）和 snubbing

（冷落）两个词的合成词，指的是在社交场合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而不是在公司里直接和对方说话，从而冷落对方的行为（Haigh, 2015）。这个词最初是由麦格理词典在一场运动中创造的，用来代表在社交场合滥用智能手机的日益严重的问题（Pathak, 2013）。Karadağ等人（2015）首次定义了“手机冷落行为”，即个体在与其他人交谈时，频繁查看或操作手机，从而逃避人际沟通。Nazir 和 Piskin（2016）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手机冷落行为是指在社交场合中，个体忽视他人的存在，转而专注于智能手机上的 Facebook、WhatsApp 或其他社交媒体应用。Chotpitayasunondh 和 Douglas（2016）则具体描述了手机冷落行为中的两种角色：“phubber”指那些在社交场合中忽视他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的个体；“phubbee”则是指那些因同伴使用手机而被忽视的人。Robert 和 David（2017）将手机冷落行为视为一种社会排斥和人际关系疏忽的现象，它反映了因使用手机而导致的社会关系中断。Kaczmarek 等人（2019）进一步指出，手机冷落行为在社交场合中表现为一种不利行为，当个体过于关注手机时，往往容易忽视他人，导致对方感到被冷落。总的来说，手机冷落行为强调了在多人社交场合中，个体过度关注手机而忽视与他人交流的现象。

1.3.2 手机冷落行为的相关理论

（1）礼貌理论

礼貌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强调了人们在社交互动中，维护个人与他人的面子至关重要。该理论将面子具体分为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两种类型。积极面子主要指的是个体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喜爱，期望在社交场合中受到正面的评价与赞赏；而消极面子则侧重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即希望自己的行动不受他人无理的干扰或阻碍，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当一个人在与他人交流时，专注于手机而忽略对方时，会让对方感觉被忽视和不重要（Kadylak et al., 2018），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同时也可能会侵犯对方的自主权，因为他们没有给予对方选择是否参与互动的机会，损害了对方的消极面子。人际对象会因其面子受损而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对双方的互动质量和关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Vanden Abeele et al., 2016）。

综上所述，礼貌理论强调了在社交互动中维护他人面子和尊重他人自主权的重要性。因此，手机冷落行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违反社交礼貌的行为，因为它可能会损害他人的面子，并减弱他们的社交联系。

（2）期望违背理论

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认为（Burgoon, 1993），人们在社交互动中会形成一系列期望，这些期望会影响他们对他人行为的解释和反应。当一个人在与他人交流时，突然专注于手机而忽略对方时，这种行为可能会违背对方的期望，对方可能会感到不满或被忽视，因为对方预期双方能够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关注，这种情绪反应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交流的态度和情感，进而影响双方的人际互动（Vanden Abeele et al., 2016）。

综上所述，期望违背理论强调了人们在社交互动中形成的期望对行为解释和反应的重要性。因此，手机冷落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违背对方期望的行为，从而引发对方的负面情绪和反应。

（3）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Homans, 1958）认为，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会衡量行为的成本与回报。当一个人选择将注意力转向手机而忽略他人时，他们可能认为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和注意力比与他人互动所带来的回报更有价值。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他们与他人之间的社会交换成本，因为他们未能提供足够的关注和参与，从而减少了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回报（Halpern & Katz, 2017; McDaniel et al., 2018; McDaniel & Coyne, 2016b）。社会交换理论还强调互惠原则范（Norm for Reciprocity），即人们倾向于回报得到的好处。当一个人选择将注意力转向手机而忽略他人时，可能会让对方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这可能会破坏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并可能在将来的交互中减少对他们的回报。

综上所述，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衡量成本与回报、遵循互惠原则以及追求公平性的重要性。因此，手机冷落行为可能会破坏与他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因为它可能会增加交流成本、破坏互惠关系，并引发对待不公平的感觉，最终影响手机冷落者的人际关系质量降低（Halpern & Katz, 2017; McDaniel et al., 2018a; McDaniel & Coyne, 2016b）。

1.3.3 手机冷落行为的相关研究

1.3.3.1 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主要探讨了个体因素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多项研究指出，性别和年龄对手机冷落行为产生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手机冷落行为（Balta et al., 2018;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 Karadağ et al., 2015,

Karadağ et al., 2016)。此外, 研究发现, 相对于年长者, 年轻人接触移动设备的频率更高 (Davey et al., 2018; Karadağ et al., 2016), 更容易产生手机冷落行为。研究还表明, 孤独感、神经质、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与手机使用和社交媒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Balta et al., 2018; McDaniel, 2015; O'Connor et al., 2013; Takao et al., 2009)。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更容易导致人们表现出手机冷落行为 (Mcdaniel, 2015)。此外, 错失恐惧 (Fear of Missing Out) 也能显著预测手机冷落行为 (Chai et al., 2018)。缺乏自控是手机冷落行为的另一重要预测因素 (Davey et al., 2018), 缺乏自控力的个体往往难以自我约束手机使用行为, 即便在某些情境中, 这种行为被视为不恰当甚至无礼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这种自控力的不足使得他们难以适应社交规范, 无法有效控制在不适当的场合使用手机的冲动。

1.3.3.2 手机冷落行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手机冷落行为与心理健康问题显著相关 (Tekkam et al., 2020)。例如, 一些研究表明, 青少年手机冷落行为会导致抑郁 (Davey et al., 2018)、焦虑 (肖曼曼 等, 2019)、社会退缩 (Guazzini et al., 2019)、缺乏自我控制 (Franchina et al., 2018; Thomée et al., 2011) 等。还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手机冷落会严重影响沟通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在交谈过程中自顾自的使用手机会对人际关系质量产生负面作用 (Przybylski & Weinstein, 2013), 降低人们之间的沟通质量 (Przybylski & Weinstein, 2013; Vanden Abeele et al., 2016)。在社交互动中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违反交际期望, 导致关系满意度降低 (Kelly et al., 2017)。例如, 在手机冷落对恋爱质量的研究中发现在亲密关系中伴侣的手机冷落行为会降低关系满意度 (Halpern & Katz, 2017; Kelly et al., 2017; Mcdaniel & Coyne, 2016a, 2016b; Roberts & David, 2017)。还有研究发现在亲子互动中, 家长若因手机而分心, 极易触发孩子的反感情绪, 这种反感情绪甚至可能促使孩子表现出愤怒的态度, 进而采取攻击性的行为作为对家长冷落行为的回应 (Frost & Rickwood, 2017)。

1.3.4 手机冷落行为的测量方法

综合前人的研究, 虽对手机冷落行为的测量尚未形成统一的通用量表, 但国内外的专家已针对特定人群多种社交情境开发了相对应的量表。以下对已有量表做简单汇总。

表 1-1 手机冷落行为量表汇总

量表名称	作者	适用情境	维度	题数	代表题目
个体手机冷落行为量表 (PS)	Karadağ et al. (2015)	一般情境	两维度	10	和别人在一起时，我的眼睛在关注手机
手机冷落行为社会规范感知量表 (PSNP)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	一般情境	两维度	5	你认为人们能意识到手机冷落行为吗？
伴侣手机冷落行为量表 (PPS)	Roberts & David (2016)	伴侣情境	单维度	9	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伴侣会看手机
领导手机冷落行为量表 (BPS)	Roberts & David (2017)	工作情境	单维度	5	当我们在一起时，我的老板把他/她的手机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手机冷落行为通用量表 (GSP)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8)	一般情境	四维度	15	如果我的手机不在附近，我会感到焦虑
被手机冷落行为通用量表 (GSBP)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8)	一般情境	三维度	22	其他人似乎会查看手机上的信息和社交媒体更新

综上所述，手机冷落行为这一概念虽是近十年产生的新概念，但针对特定人群使用的情境有着相对应的量表，主要集中在工作情境、伴侣情境、一般情境。本研究采用的是 Karadağ 等人（2015）编制的手机冷落行为量表，来测量青少年在一般情境下的手机冷落行为。

1.4 正念

1.4.1 正念的定义

“正念”（Mindfulness）一词是巴利语“sati”的英文翻译，意为“觉知”、“专注”、“专注”和“记忆”，最早有文字记载出现于《四念处经》。正念，作为原始佛教的基石与核心修持禅法，其精髓在于持续且专注地将心神聚焦于所缘之上。它要求禅修者清醒而专注地觉察身心内外的每一个瞬息万变，既不遗忘亦不令其流失。这一概念虽源于佛教禅宗，但如今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亦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促进心理健康与内在平静的重要手段。

Kabat-Zinn（2003）率先对正念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的阐释，指出正念是个体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聚焦于当前经历的过程，且这一过程不受偏见影响。通过实践正念，个体能够培养对内在体验的敏锐洞察力，进而以客观、非评判的态度接纳每个瞬间的现实，而非受其左右或逃避。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减少情绪波动、缓解压力与焦虑，更能提升内心的宁静与明晰度，增强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Cahn 和 Polich（2006）将正念细分为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状态正念描述的是个体通过正念实践在感知、认知及自我觉察方面所经历的短暂变化，而特质正念则体现了实践者在练习正念上所获得的持久性进展。另一方面，Coelho（2010）认为正念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持续且有意识的理解过程，即正念觉知，同时也表现为对当前感受保持开放、关怀的态度有意识地关注，即正念实践。段文杰（2014）认为正念是将注意力从非自主的内心活动转移到当前经历的过程，并以好奇、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来面对。汪芬和黄宇霞（2011）的观点与之类似，正念不仅是对当前经历进行非评判性关注的特定方法，还是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或心理过程。

综上所述，正念的定义已达成基本共识。不论是从动态的正念实践角度，还是从静态的正念状态或特质角度，研究者都强调了“对当前经验的专注”以及“开放的、非评判的态度”。本研究采纳了 Jon Kabat-Zinn 对正念的定义，即正念是一种专注于当下体验的心理状态，表现为全面、非评判性的觉知和注意力，涵盖了对内在体验（情绪、思维、身体感受）以及外部环境的全面觉知。

1.4.2 正念训练

1.4.2.1 正念训练概述

正念训练 (Mindfulness Training, MT) 作为南传佛教正念禅修技术的一种衍生形式, 在宗教实践中, 强调对各类感受的深入观察和意识, 致力于培养对一切体验的完全接纳的心态。通过这一过程, 个体的觉知力得以逐渐增强, 平等心得以扩展, 最终迈向觉悟与解脱的境地。而在心理学领域, 正念训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技术, 其宗教背景则较少被涉及。正念, 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觉知方式, 它要求个体如实观察当前身心内外的实时体验, 这种观察是有意识、此时此刻且非评判的 (Kabat-Zinn, 1990)。这种觉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注意力集中方法, 它要求个体有意识地、此时此刻地、非批判地将注意力集中, 并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Shapiro 等人 (2006) 提出, 正念训练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意图, 即明确练习的目的和方向; 其次是注意, 即保持对当前内外体验的持续、清晰的觉知; 最后是态度, 即以好奇、接纳和不抗争的心态参与训练过程。通过这种方式, 个体能够学会以无判断、接纳和好奇的态度, 关注并觉察此时此刻身心内外的客观体验, 这包括躯体感觉、行为反应、情绪体验以及思维活动等。这样的训练不仅能够提升个体的自我觉察能力, 还有助于增强情绪管理能力, 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内在平衡。因此, 正念训练在心理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1.4.2.2 正念训练的相关研究

正念训练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起始于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program, MBSR), 该疗法融合了行禅、观呼吸、躯体扫描、瑜伽等多种形式, 通过持续的专注练习, 逐步引导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全身, 进而促进身心健康 (Kabat-Zinn, 2003)。这一干预模式通常采用团体辅导的形式, 持续 8 周, 每周一次, 每次训练时长控制在 2 至 3 小时, 参与人数不超过 30 人。多项研究证实, 正念减压疗法在缓解病患因疾病导致的身体不适、增强应对压力能力、减轻情绪困扰以及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 进而降低了身心障碍的风险 (Carlson et al., 2003; Grossman et al., 2004; Kabat-Zinn et al., 1985; Praissman, 2008; Williams, 2001)。此外, 在普通人群中, 正念减压疗法同样展现出积极效果。研究显示, 该方法有助于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 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正念冥想和自我觉察的实践, 个体学会了接纳并减少对负面情绪的反应, 进而实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Rosenzweig et al., 2003; Shapiro et al., 1998, 2008)。综上所述, 正念减压疗法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不仅针对病患群体, 也适用于普通人群, 其积极效果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通过这一疗法, 个体能够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 并实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作为正念减压疗法的深化拓展，将传统认知疗法与正念训练的理念相糅合。与试图改变个体的负性认知或排斥负面情绪与思维不同，MBCT 的核心在于运用存在思维去观察和接纳当前的念头和情绪，秉持接纳和自由流动的态度，进而削弱负性认知的负面影响。目前，MBCT 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正念训练方法，其课程结构严谨，为期 8 周，涵盖了如 3 分钟呼吸空间、身体扫描等多种练习。该方法尤为注重注意力的培养，在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中展现出显著效果（Davis et al., 2016）。

1.4.3 正念的测量

目前国内外对正念的测量较多使用量表的方式。国外有关正念的量表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常见的有五因素正念问卷（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弗莱堡正念量表（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 FMI）、正念问卷（Mindfulness / Mindlessness Scale, MMS）、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等。

国内使用的正念量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国外量表的修订与本土自主编制的量表。在修订的量表中，Deng 等人（2011）翻译修订的五因素正念问卷与陈思佚等（2012）翻译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应用较多。本土编制的量表有适用于组织中员工的正念状态方式量表（刘平等, 2017）与王青、彭雅楠（2017）编制的正念主体性量表。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注重正念的能力、认知和状态，国内研究者编制了相应的本土正念量表，服务于特定的研究领域。本研究采用的是由 Walach 等人（2006）在原 FMI 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的简式 Freiburg 正念量表中文版，该量表语义上更通俗易懂，适用于没有正念背景的中学生。

1.5 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1.5.1 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父母使用科技设备而导致的科技干扰会阻碍亲子之间的互动，会使得双方陷入沉默，如当父母接到一个信息或电话时，可能会突然中断或结束和孩子的沟通，青少年便得不到父母及时的回应。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属于重要的微系统，并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较大影响。作为一种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且可能频繁出现的

家庭因素，亲子科技干扰可能是恶意创造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期望违背理论（Burgoon, 1993），指出在人际交往中，个体对他人的行为有期望，如果期望没有达成，违反了沟通双方彼此互动的期望，将会产生负面情绪、对关系质量有更多消极评价（龚艳萍 等, 2019; 丁子恩 等, 2022），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诱发恶意创造力（程瑞 等, 2021; 杨静, 2016）。在亲子互动中，父母的科技干扰行为会给青少年带来“预期违背”感（Vanden Abeele et al., 2016），破坏亲子关系。亲子活动遭受干扰后，个体会产生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增加攻击频率（Allen et al., 2018; 陈欣 等, 2020）。而攻击性倾向越高的个体，在多用途任务中能产生更多的恶意思法，具有更高的恶意创造力（Harris et al., 2015; Lee & Dow, 2011）。

此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经历过父母消极教养的个体攻击性较高并且创新思维更持久（De Dreu et al., 2012; 陈玉焕, 赵倩, 2012），其创造行为往往指向恶意（Harris and Reiter-Palmon., 2015; Jia et al. 2020; Lee and Dow., 2011）。而亲子科技干扰对于子女来说是一种消极的养育方式（黄紫薇 等, 202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亲子科技干扰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行为。

1.5.2 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而你却在玩手机”，这句话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手机冷落行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父母是孩子进行观察学习的重要对象，其行为的示范作用尤为明显（Bandura & Walters, 1977; 丁子恩, 刘勤学, 2022）。而亲子科技干扰的实质是父母过度的科技设备使用对亲子互动造成的干扰（McDaniel & Radesky., 2018）。那么在亲子互动中，子女可能会观察到父母的手机使用行为，并以表象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随着科技干扰行为的不断出现，青少年可能会习惯并学习父母在面对面互动的同时使用科技设备的行为，换言之，当青少年使用科技设备时也可能会出现冷落他人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人际互动中，使用手机这一行为往往会使人处于一种冷落他人或被他人冷落的情境中，也就是说，具有手机冷落行为的个体在社交场合只专注于自己的手机而无暇顾及他人，避免与他人交流，长此以往会导致人际适应困难，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增加不良行为倾向（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8; 邵蕾, 张登浩, 2021）。当处于消极的情绪体验中时，个体倾向于产生消极的想法并设置消极的目标，因此激活了恶意创造力（程瑞 等, 2021; 杨静, 2016）。还有研究发现，父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手机上会替代现实生活中与子女有意义的互动，会使青

少年感受到更多的人际关系受挫 (Bowlby, 1982)、拒绝敏感性水平增高, 因而更易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产生敌意归因, 并通过攻击来应对 (Allen et al., 2018)。根据一般攻击模型的观点, 具有攻击性倾向的个体思考问题和看待事物时都带有一定的恶意偏见 (Anderson & Bushman, 2002), 因此更容易产生恶意创造力 (Jia et al., 2020; Petrou et al., 2020)。还有研究表明, 手机冷落行为能够显著预测攻击性 (Muchacka-Cymerman, 2022), 而攻击性会促使个体产生恶意创造力 (Baas et al., 2019; Harris et al., 2015; Lee & Dow, 2011)。此外, 手机冷落行为是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冷落他人, 但在冷落他人的同时也可能被他人冷落, 因此手机冷落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排斥形式 (Robert & David, 2017), 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的恶意创造力更高 (李娇娇 等, 2023; 吴思佳, 2021)。

根据家庭风险模型, 风险家庭会破坏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功能 (即情绪处理和社交能力), 从而使其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Repetti et al., 2002)。而亲子科技干扰会让青少年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温暖与支持减少, 感觉受到忽视 (Stockdale et al., 2018), 从而使其处于风险家庭的环境中, 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因手机冷落行为导致社交能力减弱, 可能会产生外化行为问题。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 2: 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二: 手机冷落在亲子科技干扰和恶意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1.5.3 正念的调节作用

虽然亲子科技干扰会通过直接或间接路径对恶意创造力产生重要影响, 但探索哪些变量可以进一步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削弱恶意创造力具有重要价值。正念是个体的以一种包容、非批判的态度对当下加以有意识的专注的过程 (汪芬, 黄宇霞, 2011), 是一种保护因素 (Royuela-Colomer et al., 2018)。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指出正念强调对当下状态不加评判的接纳, 有助于促进个体对自身情绪及行为反应进行再感知, 减少非适应性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从而维持和提升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 (Frieze et al., 2012; Shapiro et al., 2006)。而自我控制能力水平高的个体冲动性更低 (陈晓惠, 2020), 更不容易出现手机冷落行为 (Davey et al., 2018) 以及一些外化问题行为 (Buchanan-Pascall et al., 2018; Pontes & Macur, 2021; Romm & Metzger, 2018), 如攻击行为、恶意创造力 (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1)。

正念作为一个“再感知”的过程, 即对情绪、思维进行去自动化, 减少情绪对

个体意识的自动化控制，使注意力从关注事件转为关注自身（Tang et al., 2015）。那么当个体遭遇父母的科技干扰时，高正念的个体会对父母的行为不加批判的接纳，他也就较少可能产生因遭受冷落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和问题行为。另一方面，创造性行为的互动主义模型指出，创造性行为是一种复杂的人与情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个人特征（特质、能力、意识等）和前因情境（早期社会化、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等）的互相作用对个体的创造性行为产生影响（Woodman & Schoenfeldt, 1990）。那么亲子科技干扰作为一种前因情境，它与正念的相互作用会对个体的创造力产生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三：正念可以调节亲子科技干扰影响恶意创造力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前半段。

1.5.4 正念干预

正念是一种可以通过专门的练习得到提升的积极的心理品质（刘兴华 等, 2020）。而正念干预是基于正念的定义设计的提升正念水平的系列课程或治疗方法（Teasdale et al., 2000）。通过正念干预可以提高学生的正念水平，促进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发展、提升学生缓解负面情绪的能力，进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Casson, 2017; 王怡, 李凌, 2020）。有研究发现，正念干预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个体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问题（Hofmann et al., 2010; Kabat-Zinn, 2011），那么当个体遭遇亲子科技干扰时，正念高的个体也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不会消极地模仿父母的行为进而产生手机冷落行为。还有研究发现正念减压训练可通过培养个体的正念意识及正念行为进行压力管理，对调节情绪、维护身心健康有正向促进效果（Botha et al., 2015）。那么当遭遇亲子科技干扰产生消极情绪时，正念高的个体也会积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那么也就较少可能产生因消极情绪带来的恶意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四：正念干预能够削弱亲子科技干扰的影响，降低个体的手机冷落行为和恶意创造力。

第 2 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问题提出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来说，目前国内外关于恶意创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而针对中学生的比较少。亲子科技干扰作为一种科技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家庭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研究较少。且目前新形式的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行为一旦发生就会给受害者带来身心上的伤害，还可能导致其长期的心理阴影，甚至影响他们的人生轨迹。因此，选择青少年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以丰富青少年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干预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提供途径。

第二，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父母教育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还有诸多研究聚焦于亲子科技干扰给孩子带来的问题性行为，但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晰。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以下问题：科技干扰是如何影响恶意创造力的？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可以深入了解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在寻找这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中介变量中，发现虽已有研究表明亲子科技干扰能够预测手机冷落行为，且手机冷落行为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性行为，如攻击、抑郁等特质，且正念这种能够意识到自身风险行为的能力与这种作用机制下的心理状态相反，而手机冷落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和正念这一调节变量还未被研究。因此，本研究从探讨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行为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引入手机冷落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正念作为调节变量，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恶意创造力前因变量，揭示科技背景下，青少年恶意创造力行为的形成机制，拓展了恶意创造力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第三，已有研究证实，正念干预能够改善个体的认知和问题性行为，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处理负面情绪和压力（Bulzacka et al., 2018; 陈洁宇, 向慧, 2021; 高燕 等, 2022; 洪程晋 等, 2022），那么正念是否能够降低个体的恶意创造力水平呢？它是否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处理负面情绪和压力，从而减少恶意创造力的发生？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拓宽正念干预在减少恶意创造力方面的作用。

2.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科技设备广泛使用的背景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科技干扰如何影响孩子的恶意创造力。通过深入了解这种影响，理解科技如何影响家庭环境和个体的心理发展，通过揭示手机冷落行为的中介作用和正念调节作用，为家庭教育和心理辅导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综上所述，该研究目的在于全面理解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改善家庭关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策略。

2.3 研究意义

2.3.1 理论意义

(1) 随着科技的普及和进步，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设备，这会对创造力产生影响，恶意创造力作为创造力领域的“负面形态”，开展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影响的机制研究，可以丰富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理解恶意创造力的生成机制。

(2) 家庭是青少年最主要的社会环境，家庭中的科技使用方式可能会对青少年的创造力产生深远影响。亲子科技干扰作为外部家庭因素，中学生手机冷落行为和正念作为个体内部因素，根据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综合考虑个体与环境对恶意创造力的共同作用，有助于认识到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延伸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的研究视角。

2.3.2 实践意义

(1) 青少年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或违法行为相关。通过分析中学生的恶意创造力产生的动机、心理因素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能更好地理解其问题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普及恶意创造力的特点和表现形式，这有助于家庭和学校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和心理干预手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而减少恶意行为的发生。

(2) 研究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干预提供重要参考。可以为培养学生的积极创造力提供启示，教育者可以据此设计更加有效的教育和培养方案，进

一步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善意创新能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期望能够预防和干预恶意行为，减少校园暴力、欺凌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

总的来说，理解恶意创造力动机、干预措施对于解决中学生恶意行为问题、促进积极创造力的发展、建立和谐校园氛围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4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研究一基于期望违背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家庭风险模型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具体假设如图 2-1 所示；研究二依据假设四进一步探索正念干预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假设一：亲子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恶意创造力。

假设二：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三：正念能够调节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手机冷落行为与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即正念调节直接效应与中介路径的前半段。

假设四：正念干预能够削弱亲子科技干扰的影响，降低个体的手机冷落行为和恶意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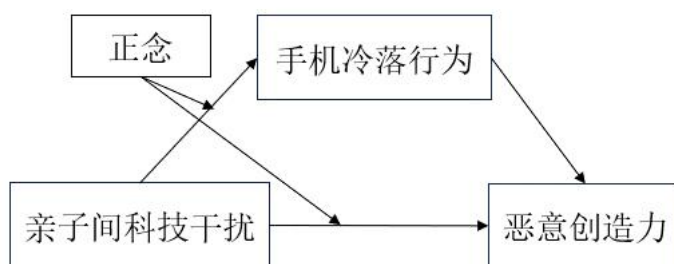


图 2-1 亲子科技干扰影响恶意创造力的假设模型图

第3章 研究一 亲子科技干扰对青少年恶意创造力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河南省两所初中和两所高中发放问卷 850。剔除回答不完整、答案全部一致或具有明显规律的虚假作答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792 份，有效回收率 93%。其中，男生 390 人，女生 402 人，初中 579 人，高中 213 人。被试年龄范围为 12-20 岁，平均年龄为 14.75 岁（标准差为 1.56 岁）。

3.2 研究工具

3.2.1 亲子科技干扰量表

采用 McDaniel 和 Coyne（2016a）编制的生活事件中的科技干扰量表，该量表适用于多种关系，本研究将该量表翻译并应用于亲子关系之间，用于青少年评估在与父母进行交往时，由于父母使用电子产品而带来的亲子间互动干扰（刘勤学 等，2021）。量表采用 Likert 8 点计分，0 代表“从不”，7 代表“一天 10 次以上”，共 5 个条目（例如“在我和父母面对面交流时，他们会给别人发信息”）。总分是通过 5 个条目分数相加而得。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亲子关系中科技干扰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3.2.2 手机冷落行为量表

采用 Karadag 等人（2015）编制的手机冷落行为量表。该量表包含沟通干扰和手机痴迷 2 个因子，共 1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1 代表“从不”，5 代表“总是”。总分越高表明手机冷落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翻译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3.2.3 恶意创造力量表

采用郝宁和杨静（2016）编制的恶意创造行为量表，测量个体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恶意创造力行为倾向。该量表共 13 个条目，针对日常生活中产生恶意思法

的频率进行 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没有”，5 代表“总是”，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

3.2.4 简式 Freiburg 正念量表

简式 Freiburg 正念量表是由 Walach 等人（2006）在原 Freiburg 正念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的，对原量表不适宜的条目进行删减，最终形成具有 14 个条目的简式 Freiburg 正念量表。此量表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法从“很少这样”到“总是这样”。总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正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

3.3 数据处理

本研究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采用 SPSS 21.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推荐的 Bootstrap 方法、应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http://www.afhayes.com>）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被试以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答题，因此会受到一致性动机、社会赞许效应、内隐相关偏差等因素影响，加之或许会因为题目特征、问卷内容、施测环境而造成偏差，因此对其 Harman 单因素同源误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以往研究结论表明，若第一成分能够解释方差的最大变异超过 40%，则认为研究存在较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主成分只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 19.3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5 研究结果

3.5.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如表 3-1 所示，对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正念在性别变

量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男生的恶意创造力显著高于女生 ($t = 2.62, p < 0.01$)。

表 3-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M	SD	t
正念	男	29.37	6.05	1.72
	女	28.60	6.51	
手机冷落	男	24.86	8.29	1.79
	女	23.80	8.22	
亲子科技干扰	男	10.96	8.50	0.93
	女	10.37	9.27	
恶意创造力	男	24.79	8.67	2.62**
	女	23.16	8.73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3.5.2 各变量在学段上的差异检验

对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正念在学段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如表 3-2 所示, 结果发现, 高中生的正念、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水平均显著高于初中生 ($t = -4.09, p < 0.001$; $t = -4.87, p < 0.001$; $t = -4.46, p < 0.001$)。

表 3-2 各变量在学段上的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i>M</i>	<i>SD</i>	<i>t</i>
正念	初中	28.43	6.23	-4.09***
	高中	30.47	6.24	
手机冷落	初中	23.47	8.24	-4.87***
	高中	26.64	7.91	
亲子科技干扰	初中	9.77	8.51	-4.46***
	高中	13.07	9.48	
恶意创造力	初中	23.81	8.76	0.48
	高中	24.38	8.68	

3.5.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亲子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手机冷落行为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检测变量	<i>M</i>	<i>SD</i>	1	2	3
1 亲子科技干扰	10.67	8.90	—		
2 手机冷落行为	24.32	8.26	0.44***	—	
3 正念	28.98	6.29	0.13***	0.11**	—
4 恶意创造力	23.96	8.73	0.21***	0.33***	0.13***

3.5.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采用 Model 4 检验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后，亲子科技干扰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 ($\beta = 0.18, t = 5.03, p < 0.001$)，可以显著预测手机冷落行为 ($\beta = 0.40, t = 12.41, p < 0.001$)；手机冷落行为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 ($\beta = 0.28, t = 7.36, p < 0.001$)。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一步发现，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与恶意

创造力之间中介作用显著, $\beta = 0.11$, $Boot SE = 0.02$, 95%的置信区间为[0.075, 0.154], 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比例为 61.1%。

第二步,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使用 Hayes (2013) 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分析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和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前半段)是否受到正念的调节。使用 Model 8, 检验手机冷落行为在亲子科技干扰和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受到正念的调节, 结果表明(见表 3-4): 亲子科技干扰和正念的交互项对手机冷落行为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11$, $t = -3.62$, $p < 0.001$),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 [-0.164, -0.049], 不包括 0, 说明正念可以调节亲子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之间的关系。亲子科技干扰和正念的交互项对恶意创造力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 = 0.02$, $t = 0.51$, $p > 0.05$),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 [-0.046, 0.079], 包括 0, 说明正念并不调节直接路径。

表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²	<i>F</i>	β	<i>t</i>
手机冷落行为		0.48	0.23	47.43***		
	性别				-0.04	-1.19
	年龄				0.15	4.54***
	亲子科技干扰				0.40	12.42***
	正念				0.02	0.48
	亲子科技干扰×正念				-0.11	-3.62***
恶意创造力		0.35	0.13	18.71***		
	性别				-0.06	-1.93
	年龄				0.04	1.21
	亲子科技干扰				0.06	1.54
	手机冷落行为				0.28	7.30***
	正念				0.08	2.45*
	亲子科技干扰×正念				0.02	0.51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来进一步检验正念的调节作用，以调节变量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低正念组和高正念组，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 3-1）。结果显示，在高正念（ $\beta = 0.30$ ， $t = 6.83$ ， $p < 0.001$ ）、低正念（ $\beta = 0.51$ ， $t = 11.50$ ， $p < 0.001$ ）的个体中，亲子科技干扰都能显著正向预测手机冷落行为。但是，随着正念水平的提高，亲子科技干扰对手机冷落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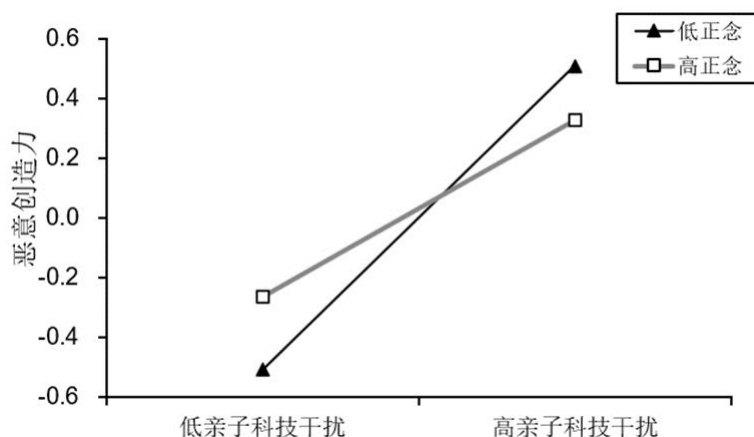


图 3-1 正念在亲子科技干扰与手机冷落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3.6 小结

研究一通过问卷调查法调查中学生的亲子科技干扰、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与正念水平现状，探究亲子科技干扰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男生的恶意创造力显著高于女生，高中生的正念、手机冷落行为、恶意创造力水平均显著高于初中生。在变量关系上，亲子科技干扰既能直接影响恶意创造力，也能通过手机冷落的中介作用影响恶意创造力，且正念能够调节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在此基础上，研究二进一步通过实验考察是否能够通过正念干预控制这种影响。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85002134334012002>